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七四期 ——

(二〇〇四年四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4a)

| | |
|-------------------------|-----|
| 【史料辨析】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 | 王彬彬 |
| 【当事者说】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 吴德 |
| 【史海钩沉】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 | 范似栋 |
| 【春秋史笔】毛泽东晚年的宠臣——双面狐狸陈锡联 | 岗奋 |
| 【史实辨正】川岛“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 | 严家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料辨析】

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

• 王彬彬 •

—

1998年，是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有关单位举行了纪念活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编了一本《许广平纪念集》，于2000年3月出版（1）。纪念集收录了十多篇今人纪念许广平的文章，其中好几篇谈的都是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贡献。毫无疑问，许广平对鲁迅日常生活的回忆，对鲁迅著作以及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为人们了解、认识鲁迅提供了极重要的帮助。要说这是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当然也能成立。由于许广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许广平的这份贡献很大程度上还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但是，许广平对人们了解、认识、研究鲁迅，却绝非只有正面意义，也有很明显的负面作用。也由于许广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她的这种负面作用，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人无法代替的。鲁迅的形像在1949年后的被改写被歪曲，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在“文革”中尤

为严重。“文革”期间的鲁迅，满身都被涂上了政治釉彩。在改写和歪曲鲁迅方面，最基本的一点，是对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系做了颇为违背事实的说明、解释。说得直白些，也就是把鲁迅描绘得像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样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像“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一样对毛泽东“无限爱戴、无限崇拜”，甘当“毛主席的小学生”。这当然是极为荒谬可笑的。然而，在这样一种对鲁迅的改写和歪曲中，在这样一种对鲁迅大涂政治釉彩的行动中，也有许广平的份，甚至可以说，许广平正是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由于许广平的特殊身份，她对鲁迅所作的违背事实的说明、解释，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就特别严重。我觉得，在许广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充份肯定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固然无可厚非，但指出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负面作用，指出许广平改写和歪曲鲁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无必要。

近几年，不少人对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予以追究。参与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的写作，是余秋雨“文革”期间写作活动之一种，也是今天被追究的事情之一。何满子曾说：“石一歌，即隐身在这个笔名下的11位某某们，是‘四人帮’卵翼下的鲁迅研究专业户。所谓鲁迅研究，就是把鲁迅改造成‘四人帮’的守护神。”〔2〕曾与余秋雨同属“石一歌”名下的孙光萱最近也回忆道：“《鲁迅传》编写组成立于1972年1月3日……《鲁迅传》编写的办法是分头执笔，然后互相传阅，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鲁迅传》上册定稿以后（出版较晚，已在1976年4月），继续写下册。”〔3〕这本1976年4月出版的《鲁迅传》，我最近在路边地摊上购到。这本《鲁迅传》当然对鲁迅有着严重的改写和歪曲，其中时刻不忘的，是暗示和提醒人们鲁迅虽组织上未曾加入共产党，但在思想上，行动上却早已加入了共产党。当然，与此同时，也着力强调，鲁迅虽终生未与毛泽东见面，但却对毛泽东极为热爱，崇敬。例如，在写到鲁迅“五四”时期的活动时，要刻意强调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说毛泽东那时“光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代表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而“当时的鲁迅，虽然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但是，由于他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把批判孔孟之道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他就能坚定地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向取同一步调”〔4〕。至于余秋雨，按他自己的说法，“参与”了本书中鲁迅在广州一段的写作〔5〕。这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余秋雨们也是紧扣住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来做文章的。例如，说鲁迅在广州时期的“战斗檄文，已初步体现了他新的思想高度，反映了他自我解剖的思想成果，已清楚地表明了鲁迅正是在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自觉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了”〔6〕。再例如，说鲁迅之所以离粤赴沪，是因为“向往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想在那里寻求新的战友，开辟新的战场”〔7〕。这样一种对鲁迅的说明与解释，当然是一种改写和歪曲，离真相颇远。就说鲁迅之所以到上海吧，也实在是无奈的选择。开始时鲁迅并未打算在上海长住，此后也一直未在上海安下心来，对上海的厌恶是强烈的，且持续至死。〔8〕

但“石一歌”对鲁迅的改写和歪曲，却并非他们想出的新花样，仍不过是在重复此前已很流行的观点，仍不过是在鹦鹉学舌。而许广平，就是被学之舌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舌。早在写于1949年10月的《在欣慰下纪念》一文中，许广平就自觉地把鲁迅置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待接触到1927年大革命血的实际教训，就更加确定了鲁迅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确信，和全心全意在它领导下忠诚奋斗到底！……有了正确的领导之后，鲁迅的一切工作，不再是他自己个人的独自表现，而是在全中国人民都共同一致的大合奏里了”。而“大合奏的指挥者是谁呢？无疑地就是今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拥护的英明领袖毛主席”〔9〕。在“大跃进”时期，许广平写了一本《鲁迅回忆录》。在前言中，许广平说是“在大跃进精神的感召下”写作此书的，并且强调：“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他梦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如何为党更好地工作，如何想法为党和革命造就大批的战士。”〔10〕在对鲁迅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系所做的改写和

歪曲上，无论是“石一歌”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未能超越许广平的程度。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

二

对鲁迅最集中最严重的改写和歪曲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爆发，“中央文革小组”便开始通过改写和歪曲鲁迅来为“文革”服务。“石一歌”受命编写《鲁迅传》，也是这种改写和歪曲工程中的一部份。而且，就在“石一歌”编写《鲁迅传》的同时，姚文元也在写一本《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并且下令上海有关人员为其收集整理资料。

许广平病逝于1968年3月初。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许广平便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谈鲁迅的长文。“文革”一开始，周扬便被“揪出”，许广平立即在《红旗》上发表了《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文章，对周扬以及夏衍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列举的周扬等人的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竭力反对写鲁迅和党的关系，反对毛主席对鲁迅的巨大影响”。许广平对周扬1949年后的一些言论做了揭露，其中之一，便是周扬1961年3月在对电影剧本《鲁迅传》创作人员的谈话中，强调“鲁迅究竟不是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投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还是着重写他作家的活动，革命活动作为他内在的，精神上的呼应。把他和革命活动的联系写得太直接了，第一违背历史，第二鲁迅就被动了，难了”。周扬这样说的初衷如何，姑且不论，但要求这样写鲁迅，都是更符合实际的，在今天看来，恰恰是对鲁迅的尊重，客观上是在阻止对鲁迅的过份的改写和歪曲，但许广平却把这称之为对鲁迅的“攻击和诬蔑”。许广平极力强调鲁迅一贯热爱共产党，在后期则“无限崇拜”毛泽东：“我记得很清楚，1936年夏季，鲁迅听到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即倾心悦服，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他感到中国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鲁迅生前虽然没有能够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但是他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热情拥护，心悦诚服的。”

1966年第14期的《红旗》杂志，在《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的栏目内，发表了6篇署名文章，外加一篇《红旗》杂志的社论。署名文章的第一篇是姚文元的《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第二篇是作为“红卫兵”代表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黄平稳的《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第三篇是北京长征中学（四十四中）学生刘路的《斥西蒙诺夫》，在文章中，刘路时而自称“红卫兵”，时而自称“红小兵”，他的文章，既可视作是在代表“红卫兵”，也可视作是在代表“红小兵”。第四篇是许广平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第五篇是郭沫若的《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第六篇是陈伯达的《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闭幕词》，最后是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6篇署名文章，都是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发言。纪念大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操持的。大会的召开，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背景。国际方面，“文革”爆发后，苏联等国家的报刊发表了非议的文章。例如西蒙诺夫在《文学报》上撰文纪念鲁迅，强调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以此来否定中国的“文革”（11）。国内方面，“文革”正处高潮，怎样把“文革”引向深入，怎样让“红卫兵”等“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长期保持昂扬的状态，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等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纪念鲁迅的大会，意在鲁迅进行集中的改写和歪曲，对鲁迅形像来一次彻底的重塑。回应西蒙诺夫等人的非议当然是目的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利用鲁迅来为国内的“文革”服务，让鲁迅来为“文革”提供合法性。

通读这组文章，可看出主旨有这样几点：

（一），把鲁迅说成“无限热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从而，学习鲁迅，首先就要

“全心全意地听毛主席的话”。这样一种逻辑，在每篇文章中，都有明确表达。例如，黄平稳文章就是以“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为标题的。郭沫若文章则别出机杼，说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他强调：“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紧接着，很动情地说：“我们要学习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替我们留下来的这种良好的榜样。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生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的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我们就应该更加百倍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红旗》杂志的社论也强调：“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因而，“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鲁迅那样，坚决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姚文元们十分清楚，“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红卫兵”等“革命群众”之所以能发动起来，与全民性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分不开。要让这场“革命”继续下去，保持和加强对毛的个人崇拜至关重要。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毛的崇拜者，就是为“红卫兵”等“革命群众”树立了一个具有极大号召力的榜样。

（二），极力强调鲁迅的“造反精神”，把鲁迅的“造反精神”与“文革”这场“造反运动”挂上钩，并且让人们相信，如果鲁迅生在今日，也会积极投身于“文革”的。郭沫若的文章，《红旗》杂志的社论，都强调了鲁迅敢于“造反”、敢于“破坏”的精神。在“文革”高潮中高举这种精神，用意是不言而喻的。郭沫若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为题的文章，开篇不久，便宣称“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造反的一生”。而“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过的高峰”。《红旗》杂志的社论也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鲁迅正是这样。”——既然鲁迅假若生在今日，也会站在“文革”的最前列，那“有幸”确实生在今日的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三），强调鲁迅的“打落水狗的精神”，强调鲁迅的“不宽恕的态度”。姚文元总结四条“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战斗遗产”，第一条便是“‘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他写道：“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政权需要这种战斗精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同样需要这种战斗精神。鲁迅对人民的敌人有很高的警惕性，他看透了阶级敌人是很毒辣很狡猾的，对于他们决不能讲什么慈悲，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疾恶如仇’，他却‘疾善如仇’，你想放松他，他却决不会放过你，他会玩出许多使你妥协的假面目，但他自己是决不妥协的。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总结了许多血的教训，指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如果不把‘落水狗’彻底打垮，等它们爬上岸来，就要咬死许多革命的人，就要付出更多的血的代价，至少要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姚文元的话，看似在说鲁迅，其实字字句句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姚文元还对“不肯打‘落水狗’的所谓‘老实人’”，对“无是非观”的“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表示了强烈的憎恶。陈伯达文章，也主要强调鲁迅的“不宽恕”的精神，认为“这是鲁迅给我们的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要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在这次纪念大会召开时，已有一大批人“落水”，而在姚文元、陈伯达心目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变成“落水狗”。这些人，仅仅把他们打落水中，还远远不够，还应进一步痛打之，直至最后消灭。而号召学习鲁迅的“打落水狗”精神和“不宽恕态度”，就是要促使“红卫兵”等“革命群众”对已被打落水者更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果在痛打“落水狗”时心有不忍，如果在痛打“落水狗”时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那说明自己立场还不坚定，意志还不坚强。“资产阶级的意识还在头脑中作怪”。

（四），强调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姚文元在总结鲁迅“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的“战斗遗产”时，第二条便是“要发扬鲁迅坚韧、持久的革命精神”。姚文元说：“鲁迅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曲折和反复，聚合和分化，革命队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他像一棵在风霜中巍然屹立的劲松，不畏黑暗，不怕强暴，始终坚持着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战斗，不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炼出一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12）因而，“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应该做到“遇到暂时挫折，不消极，不埋怨，不灰心，不逃避，不怕围攻，不怕‘孤立’”。“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没有阻力。这阻力既可能来自上层，也可能来自民间，还可能来自“造反派”内部。号召学习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也是要“造反派”做到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都不动摇，不妥协，不后退。

如果说姚文元、陈伯达、郭沫若的文章像是“动员令”，那作为大学生的黄平稳和作为中学生的刘路的文章，则是“决心书”了。他们的文章，把姚文元等人希望他们做到的事情，说得更明白了；把鲁迅与“文革”的关系也说得更直接了。例如，黄平稳文章中有这样的誓言：我们要学习鲁迅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坚持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展开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进行义正辞严的口诛笔伐。我们要破字当头，敢字领先。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革命、敢造反，狠打“落水狗”，奋勇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要学习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善于斗争，善于革命。不怕打击，不怕挫折，不怕黑云迷雾大，不怕狂飚雷电，不怕阻力大，不怕反复多，革命到底，造反到底，毫不气馁。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全面地、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倒调和主义，打倒折衷主义，打倒奴隶主义……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学习鲁迅憎爱分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横眉怒对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要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三

现在，我们来看看许广平在这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说了些什么。

许广平文章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全文主旨也在于努力把鲁迅置于“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

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所有这一切，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我们从鲁迅逝世前不久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更可以看到鲁迅是怎样倾心热爱毛主席……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许广平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鲁迅是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所“照耀”、所“引导”、所“鼓

舞”的同时，也对周扬等人进行了严厉斥责。公正地说，许广平并没有像姚文元、郭沫若、陈伯达等人那样，把所谓“鲁迅精神”与“文革”中的“造反”很直接地联系起来，并没有号召在“文革”中发扬鲁迅的所谓“造反精神”、“打落水狗”精神和“韧性”精神，但她十分清楚，召开这次纪念鲁迅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鲁迅来为“文革”的合法性服务。而她，某种意义上是鲁迅的代言人。倘若在她的讲话中丝毫看不到鲁迅与“文革”的直接联系，倘若她不代表鲁迅对“文革”做出肯定的表态，那是无法令“文革”的发动者们满意的。于是，在讲话开头，她也只得说道：“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鲁迅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尤其在解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就更让人为难。要把鲁迅说成一个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尤其要把鲁迅说成是毛泽东的学生式的人物，其他人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最有资格最无须顾忌地说这种话的人，只有在某种意义上是鲁迅化身的许广平。在1949年10月写下的《在欣慰下纪念》一文中，在“大跃进”期间写作的《鲁迅回忆录》前言中，许广平就已开始把鲁迅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调整为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信仰与被信仰、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在“文革”高潮中召开的这次纪念鲁迅大会上，姚文元、郭沫若等人的发言，在说到鲁迅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时，基本上没有超出许广平此前所做的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必须严守分寸，只能依着许广平已定下的调子去说，突破许广平定下的基调，对他们来说是不妥的。而恰恰是许广平，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在说明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又有了自我突破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只有许广平一人能这样说，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首先把话说到这种程度，而一旦许广平率先这样说了，其他人再跟着说也就无妨。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广平在这样为鲁迅定位时，强调了“所有这一切，至今我还历历在目，永生难忘”。这样一来，事情的真实性就似乎无可置疑了。许广平要让人们知道，她说出的，并非是对鲁迅的主观理解，而是她亲眼所见的鲁迅自身的客观表现。完全有理由相信，1949年后的许广平，尤其在“文革”高潮中的许广平，是真心希望人们像她所说的那样去理解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是真心希望人们把鲁迅当作毛泽东麾下的一名“小兵”的。

那么，许广平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地在毛泽东面前矮化鲁迅呢？细究起来，她心中实在有着难言的苦衷。实际上，她是在以矮化鲁迅的方式来保卫鲁迅，哪怕被保住的，不能不是一个被改写、被歪曲、被丑化了的鲁迅。而保卫鲁迅，对于她来说，也就意味着自保。此话又怎讲呢？

王富仁先生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书中指出：“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想中维持了外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有三种思想：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毛泽东思想；三，鲁迅思想。其他所有的思想即使存在也不具有最终的裁判权。而这三种思想则不同的范围都具有自己独立被运用的可能”（13）。而正是鲁迅的这样一种与毛泽东并肩的状态令许广平深感不安。追求“君师合一”的毛泽东，无论在政治权威的意义上还是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都并不愿意有人与自己是等高的。对作为祖师爷的马克思，1949年后的毛泽东也敢于表示不敬。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强调要“破马克思”，号召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不要迷信”。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更强调对马克思不要“怕”，不要把马克思看得“高不可攀”：“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14）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实践”上超过了马克思，在“理论”上也超过了马克思。——当然，这里的“我们”，只能是毛泽东的代名词。对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轻蔑

性的话，只有毛泽东一人能说。而毛泽东说了之后，必然有人跟着说。例如，在1958年7月出版的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创刊号上，以头条位置发表了深受毛泽东赏识的该省主要负责人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主义》，只是由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的反对，才把“超过”换成“发展”。再例如，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抛出了“顶峰论”，鼓吹只学毛泽东著作就够了，不必学马列，因为“马克思没有写过什么哲学著作，列宁不过几篇小文章”。“革命导师”中，毛泽东最伟大。（15）

连作为祖师爷的马克思，毛泽东都觉得“不在话下”了，那他能容忍鲁迅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与自己双峰并峙吗？鲁迅在1949年后的思想权威的地位，本就是由毛泽东“钦定”的，或者说，本就是毛泽东把鲁迅“提携”到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的。既然曾经把马克思奉若神明的毛泽东终于连马克思也容不下了，那他要把鲁迅打下去，就更容易了。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一篇怀念刘少奇的文章中说：“庐山会议最后一次大会上，刘的总结讲话中大谈个人崇拜的重要……10月1日见到报纸头版并列两主席大幅照片，心中自然涌出：对少奇这并非好兆头……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当权派’刘少奇，我就毫不奇怪了。”（16）李锐看到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照片并列而为刘少奇担忧，许广平看到鲁迅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与毛泽东比肩，又怎能不为鲁迅担忧呢？鲁迅与马克思毕竟不同，一旦由毛泽东开口对鲁迅有所轻蔑，有所非议，鲁迅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深明此理的许广平，极力否定鲁迅在思想上与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极力把鲁迅描绘成毛泽东思想上的学生和行动上的追随者，并且真诚地希望别人也这样说，就是为了毛泽东能够舒心，不至于从他口中说出对鲁迅不利，从而更是对许广平自身不利的话来。许广平目睹了郭沫若等人为自保而不遗余力地向毛泽东表忠心，而作为鲁迅化身的许广平要自保，也就必须由她来代替鲁迅向毛泽东表忠心。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一文中，许广平先引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鲁迅的那段著名论述，并且说：“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紧接着，再说鲁迅对“最敬爱的毛主席”又是如何热爱崇敬，——这几乎成为1949年后许广平解释鲁迅时的一种模式。这样做，无非是保住鲁迅“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地位，说得再明白些，是为了保住鲁迅在思想权威的意义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许广平的一片苦心，正在于此。

冯雪峰“落水”后，许广平批冯雪峰；周扬“落水”后，许广平批周扬。但她在列举冯雪峰、周扬等人的罪状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否定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否定鲁迅对毛泽东的信服、崇拜。对周扬的批判，前文已说过。在写于“大跃进”时期的《鲁迅回忆录》前言中，许广平在强调了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之后，对其时已成为“右派”的冯雪峰进行了批判：“冯雪峰在他所谓的《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先生自己是最清楚的，是左联在借用他的地位与名誉’，这是严重的歪曲，是他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于鲁迅无损。”许广平心里非常清楚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正如冯雪峰所说的那样，她却又是真的痛恨冯雪峰、周扬们说出历史的真相。把“五四”时期的鲁迅就说成深受共产主义影响，把“左联”时期的鲁迅说成“党的一名小兵”，是许广平保住鲁迅从而自保所必须的。

为了保住鲁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思想权威的地位，许广平不仅仅极力改写鲁迅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系。胡风“落水”后，激烈批判胡风，甚至称胡风为“匪徒”，说胡风一贯与鲁迅对立；冯雪峰“落水”后，激烈批判冯雪峰，说冯雪峰当初就令鲁迅厌恶。胡、冯二人与鲁迅关系亲密，许广平这样说，无非是在“划清”鲁迅与他们的“界线”，不至于因为他们的“落水”而对鲁迅产生不良影响。周扬、夏衍，历史上与鲁迅不睦，当他们在台上时，许广平尽量回避和淡化鲁迅与他们的矛盾，极力强调鲁迅与他们融洽的一面。“左联”时期，直接代表党的，毕竟是周、夏等人，而所谓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当然也就直接是周、夏等人的“一

名小兵”。周、夏“落水”后，许广平则愤怒地指责他们对鲁迅的不敬，甚至说鲁迅的死，是周扬等人“迫害”所致。（17）而既然鲁迅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那周、夏等人对鲁迅的“迫害”，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表现了。

我知道，对许广平1949年后的言行，自应有一种“同情的了解”。我明白，许广平对鲁迅的改写，自有难言的苦衷。但许广平毕竟参与了对鲁迅的改写，并且在这种改写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领头羊般的作用。长久地掩饰这一点，是不应该的。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对人们历史上的过错进行道德谴责，会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因此，我也并不想在道德人格的意义上对许广平说三道四，——尽管我并不认为道德意义上的评价就真的毫不合理。

注释：

- （1）《许广平纪念集》，由百家出版社出版。
- （2）何满子：《笔名谈屑》，见萧夏林、梁建华主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
- （3）见孙光萱《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载2000年4月6日《文学报》。
- （4）石一歌：《鲁迅传》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版。
- （5）见余秋雨《答余杰先生》，载《深圳周刊》总312期。
- （6）（7）见石一歌《鲁迅传》第十二章《伟大的飞跃》。
- （8）拙著《鲁迅晚年情怀》对此有较详论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 （9）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初版。
- （10）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前言》，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版。载1966年第12期《红旗》，《红旗》为半月刊。
- （11）见刘路的《斥西蒙诺夫》和郭沫若的《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 （12）姚文元在这里对鲁迅原话的引用，颇堪玩味：“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是鲁迅原话，但紧接着的“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并非鲁迅原话，却也加上了引导，我觉得这应该是刻意的改写和蒙骗。
- （13）见该书第162—16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 （14）见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一文，收于《直言》一书，薛晓源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 （15）见李锐《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看法》，收于《直言》一书。
- （16）见李锐《〈刘少奇百年祭〉序》，收于《直言》一书。
- （17）见许广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

□ 原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一期

~~~~~

【当事者说】

## 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 吴 德 •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



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

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 摘自《百年潮》2004年第2期

~~~~~

【史海钩沉】

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

• 范似栋 •

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注释第二十三条

林彪事件后，原来的三大政治势力集团只剩下周恩来为代表的以政府部门为基础的元老派，和江青为代表的以宣传部门为基础的文革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前者要否定文革，他们大多是文革时期政局变动的失利者；后者要肯定文革，他们几乎都是文革的得利者。元老派关于治国的政策主张与毛泽东有很大分歧，这也是文革的起因之一，因此，从本质上说，元老派也反毛泽东和反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感情和立场在文革派新人那一边，不仅江青是他的夫人，而且因为他们更多地继承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革命思想，文革派实质上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张春桥历来的政治表现仅仅是一种伪装。如果他上台执政，也会把强国富民作为他的目标。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不爱国的。

毛泽东必须为自己的身后的中国开始布局。他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如何安定和团结呢？他有两个谋略来操控政治局势，从而促使安定和团结。一是在两派之间搞平衡，削平过大的山头，当年的批林批孔就是这种平衡手法的实际运用。那时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这一派的力量一下子膨胀；二是提拔新的中间性的第三势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也就是一种平衡。毛一度想把王洪文培养和塑造成中间性的第三势力，但直到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到长沙面见毛，状告周恩来，从此毛认为王受了江青的影响，和江青、张春桥他们搞在一起了，失去了成为第三势力的价值和可能。毛只能重新找人，结果找到华国锋。

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婆的基本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尤其在七四年，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没少说。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因为江青反对邓小平率团去美国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而周持支持的态度。毛写信给江青，态度也很严厉：“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七四年十一月，毛又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的毛病和问题全给毛泽东说中了。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文革时他又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脾气性格，如反复无常，狂妄自大，甚至有时歇斯底里，大吵大闹等等，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但为了打倒刘少奇，毛除了自己的老婆，不敢相信其它人。

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不顾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僚的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江青以前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电影小姐，而且天性倔强，自然很难接受毛泽东的革命家思想和“土包子”的生活习惯。在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影剧界有好些男朋友，显然那时的江青在精神和性格方面是正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有资料说江青给人普遍的印象是温和有礼。然而，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君临天下的革命皇帝，那么江也就非成为革命的皇后不可。要把一个上海滩的影星磨练成革命的皇后，这必然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痛苦过程。于是，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精神越来越怪异了。在很多方面她是毛的学生，但学习成绩不算好。当文革开始的六六年，她作为中央文革的成员，给人的印象是阴阳怪气，那时，毛泽东正在玩弄阴谋诡计，外人却不容易看出来。毛泽东玩弄政治象他的抽烟一样，吞云吐雾，不可离开须臾。而吸入二手烟最多，中毒也最多的正是江青。

对江青精神和性格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毛和江青之间的长年分居。分居之后，六十年代初，可能更早，江青想要见毛都很难。她长期住在静园，那里曾是清朝一个王妃叫珍妃的住所。那个王妃是光绪皇帝最心爱的女人，后来却被皇太后命令扔在一口井里，凄惨地死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家喻户晓，江青不可能不知，因此也就担心自己是否也会落到珍妃的下场。为了重新得到宠幸，江愿意为毛做任何的事。江青在失权后被审判时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江青在文革之前就有很多怪异的想法和行为，没有一个人挑明说这是一种病态。许多元老因此也不想和江打交道。邓小平说，我不想看见这个婆娘，她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看见江青怕。文革派内部对江青的性格变态也窃窃私语。江最好的朋友是张春桥，但

张私下都说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也对江青没有办法，因为她名义上是毛的夫人。

虽然毛与江的婚姻生活是不愉快的，甚至是个悲剧，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头脑中的家族观念却根深柢固。江青在名份上终究是他的妻子。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自己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亲情和信任。再说，在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上，按照中国传统，是毛对不起江。分居之后毛有很多女友，但至今没有人说江也有婚外情。

更进一步而言，毛对江的保护和重用也不仅仅是因为夫妻的名份关系，更多的是利用。在毛的心目中，比江青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事业，和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即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如何。文革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中更容易招致非议的一件。而江青和文革派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会保护文革的成果和名誉的，保护了文革的名誉也就保护了毛的名誉。江青没说错，她真是毛的一条狗，狗的价值正是在于被利用。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如果把江青和她的那一派抬得太高，对江青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江青倒了台毛泽东个人和路线的历史地位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毛泽东时常对江青敲敲警钟。但绝无可能，毛留下遗嘱让别人把自己的夫人和她的朋友一举歼灭。当然毛也不想江青他们把她的政敌打翻在地，一旦江青这样做并且成功了，那么她就走向了反面。

毛主席是个政治高手，他的手法被世人认为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地。七四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时，张春桥被委任为总政治部主任。七五年毛一会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另一会儿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江青等人，防止他们过激。

七五年十一月，全国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开展的持续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就此中断。毛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七六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又决定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之前，陈锡联已经代替李德生接掌了北京军区的大权。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毛也是指示陈锡联和王猛指挥三十八军秘密包围北京城，从而迫使刘少奇和邓小平下台。毛又一次相信陈锡联，认为陈是独立的中间势力，将会听命于华国锋。当时的叶剑英身体根本就无大病，所谓叶生病一说是毛的借口。

因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毛决定提华国锋为总理，同时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还决定不让叶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进一步削减元老派在中共领导层的力量，是因为元老派在社会上的潜在力量太过强大，将直接威胁到其它两派的生存。其证明就是天安门事件，那里闹事的群众表达了悼念周恩来和支持邓小平的意愿。毛在病榻上对江青和华国锋等人说，“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终于死了。以后发生的历史却和毛泽东的努力正好相反，毛的平衡布局 and 调和手法似乎没有发生作用，四人帮一下子被逮捕了。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下错棋了吗？其实不是，毛泽东生前担心的事发生了，正说明毛泽东殚精竭虑，策划制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说明毛泽东的政治精明。如果江青能理解毛泽东对她的关照和批评，并能按照毛所说的去做，至少文革派的崩溃不会那么快，那么惨。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曾有诗称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中国北宋大臣，曾抵制了一次有关皇位废立的宫廷事变。叶的确是大事不糊涂，首先他对文革的看法和评价是正确的，其次在毛死后动荡的日子里，叶没有冲锋在前，而是甘当“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对自己的威望有适当的估计和运用。同时，叶对毛是有感情的，这一点毛也没有看错，叶不属于邓小平那种做事绝决的人。这使得叶即使有“先下手”的本钱，他也不会自己亲自动手抓了先帝爷的人。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他希望扭转文革历史的轨道，却不想留下忘恩负义的名声。

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前，叶就经常和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议论国事，很自然会谈到如何对付和解决文革派的问题。是不是这些谈话表明叶曾经计划运用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权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其实正好相反，如果叶这样想的话，就反而是大事胡涂了。一来叶虽有威望，但无实权，二来形势不明，不宜轻举妄动。所以，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时，叶的表示是一切要等毛死了再说，这个“再说”其实是拖延和敷衍。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的官员说几句牢骚怨言这是家常便饭，叶这样在官场里久炼成精的人物，怎会当真。退一万步，即使叶有这个心，叶也不可能直接行动，因为叶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毫无疑问，叶对文革派是憎恶的，这在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叶粉碎文革派的动机。华和文革派的矛盾就要小的多。要说有，基本上是行事作风不同，江青难缠，鸡毛蒜皮，属于公务纠纷，所以华更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况且他上台不久，虽有主席名份但没有根基。也是退一万步，即使华有这个心，华也不可能主动出手，因为华也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华是军委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叶是资深的军委副主席，威望也高，他们指挥不动军队吗？这要从头说起。

中共军队历来就是山头林立，权力分散，并没有哪一个山头或人占有明显优势，更谈不上绝对优势。这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状况，也符合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意图。叶剑英在军中有很高威望，但并无个人指挥军队的实权和可能。林彪一度作为毛的副手，又有众多将军是他的手下亲信，但一旦出事，顷刻瓦解。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计划个别亲信暗害毛泽东，但没有计划指挥军队叛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派系太多，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即使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也指挥不动。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曾调动军队，其真实的用意是威胁，而非实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批彭德怀时，曾扬言说要上山打游击。如果毛有信心能指挥全军，他也不必这样说。由于军权分散，毛泽东也指挥不动军队。毛泽东曾问邓小平，“等我死后，中国会怎么样？”邓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也是看到了中共军权分散的问题。

将军们的思想已今非昔比。以前，那些将军们打惯了仗，不打仗心就痒。后来二十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人都懒散了，哪还想到打仗。即使文革中被批斗，批斗完了还是将军的待遇，所以大家都逆来顺受。在将军们的心里真正想的是吃太平饭，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各路人马，众多将军真正一致的地方。历史上，除了个别理想主义者以外，多数人都是活不下去才革命造反，如果能活得下去，没有很多人会革命造反。

军队历来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官兵平时受的教育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党中央团结的时候，按正规系统指挥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党中央分裂的时候，毛主席又死了的话，军队很难接受分裂后的其中一派的命令。在形势突变的时刻，即使一个团，一个营的官兵也很难统一思想，去选择服从江青的命令还是听从华国锋的指挥。

当时传言说，南京军区的司令许世友的儿子有一封信透露一个情节，说许世友曾夸口，“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但是直到四人帮被逮捕，许也没有动静。后来他又对邓小平不满，还是没有动用部队。看来这又是解放军自编的神话故事。

又有传言说王洪文扬言，上海要搞四十万民兵，计划对抗北京的中央。后来我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时，和造反派的一个民兵师师长殷在一起，他的看法是，“那是王洪文他们在吹牛在做梦，害得我坐牢。”他告诉我，“上海民兵人数共28万，编制12个师。装备有江南厂造的快艇，民兵一号，民兵二号，炮比较少，有一些上海造的高炮。比较好的装备只有一、二个师，其它的装备是朝鲜战场换下来的步枪和冲锋枪。”“问题还不是民兵的武器问题，当时打不起来原因是上海人聪明，不会有人为他们当炮灰。”“民兵哪里能打仗，我能当上师长，就可想而知。”殷在文革前是上海一个工厂的工人，被当局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完全没有军事指挥经验。

除了军事政变之外，只有宫廷政变。谁有发动一场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东兴。汪是中共中央的大内管家，御林军头领，掌管着八三四一部队。据说，当时这支部队的人数达到五万人，相当于野战部队一个军。它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中南海的警卫。不要说住在中南海的权贵政要的一举一动都在汪的眼皮底下，就是住在西山的叶剑英也难逃汪的手心。汪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保密局局长，政治局委员。

汪很早就是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江青如果可以杀人，她第一个杀张玉凤，第二个杀汪东兴。江、汪矛盾的起源还在于毛的身上。毛和江分居不和有十多年的历史。平时毛不见江，江要见毛还要汪东兴安排。江青作为正宫娘娘，她的怨气可想而知。这个怨气不能出在毛的头上，自然就落在汪的头上。经常是江青来了要见，汪进去了又出来说毛不见，江一个妇人，不知汪如何传话的，难免要怀疑汪在做手脚。多年来毛有众多女友，好象皇帝的三宫六院，在生活上也都由汪安排，江嫉恨那些嫔妃时，自然也会憎恨汪这个管家。汪为毛做了十几年的恶人，实在是百口莫辩。

汪对江的态度平时是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能避则避。真要有事，也只有他能顶江青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红得发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来了要找周。周当时的卫士长迎了上去，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突然大怒说，“你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不肯逮捕周的那个卫士长。周的夫人邓颖超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不同意。对别人说：“那个卫士长跟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江青一句气话，就把人家扔掉了。”后来汪让那人去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劳动。江青知道后也没再说什么，因为汪的背后是毛泽东。

汪东兴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关键人物。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但江青反对，周也就不敢支持了，使汪的提名成为难产。后来黄永胜出面支持，两派最后达成妥协，汪才被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汪自然对林彪感激，在九大的华北组会上汪也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汪并不知道毛、林之间的争议，还以为他们的关系很好。毛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有人要给你大官做，但不是我给，你现在翅膀硬了，要改换门庭了。”又让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汪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才重新取得毛的信任。

汪对毛后的政局也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在中共内部，表面上看，三派势力的力量比较，文革派最大，中央常委四人中占了两位，王洪文和张春桥；政治局中占了两位，江青和姚文元，

还有毛远新，地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中间派次之，中央常委占一位，华国锋；政治局委员占六位，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元老派最弱，中央常委占一位，叶剑英；政治局委员占四位，李先念、刘伯承、许世友、韦国清。文革派最团结，中间派最有行政实力，元老派最有潜力，最得人心。文革派是毛泽东吹大的气球，毛一死难免漏气。张春桥是个明白人，文革派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势必采取攻势，打击元老派，目的是把江青捧上去，建立文革派在中央常委中的绝对优势。文革派要想发动攻势，必须先取得中央保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控制权，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汪东兴自知斗争的焦点将落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有了先下手为强的念头。万一江青上台，岂但是官位问题，性命也难保。

张春桥和汪的关系不错。九大时，张当着大家的面对汪说，“以后右派搞政变的话，就要靠你了。”至少张不认为汪是文革派的敌人。所以毛刚死，张出了主张，让他们四个人，再加上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共八人一起手拉着手，在毛的遗体旁一起照了相。这就是张继承毛的遗志，划定的联盟范围和战略布局，即团结中间派，进攻元老派。但是这只是张的一厢情愿，汪不相信江青依她的性格会听张的话，受张的约束。江青长期受毛泽东唯我独尊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当女皇。毛死在江看来，她当女皇唯一的阻力没有了，其它任何人江青都不放在眼里。汪还深知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文革时期，江害了很多她在上海三十年代演艺界的朋友，甚至江以前的保姆都不放过，那时还给关在监狱里。所以虽然张春桥多次向他示好，汪也决心不投靠江和她的文革派。汪对华的印象不错，曾经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华刚被选定为毛的接班人，汪就有了和华联盟，一统天下的愿望和计划。汪和华一样都是文革时期的得利者，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主张上不象文革派那样偏激，也不愿象文革派那样围着江青转。汪也对元老派怀有很深的戒心。汪是毛泽东的卫士出身，能有今天全靠着这棵大树。元老派被毛压了这么多年，往后决不会把他当自己人。

七六年七月，毛已经神智不清，看来再难恢复。汪故意多次找华谈心，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华支支吾吾，有几个月没敢回答汪，这毕竟是宫廷政变，天大的干系。毛曾经评议华“厚重少文，但是办事不蠢呀”。华反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有一点他很清楚。华的主席名份虽然重要，但比不上汪的锦衣卫加御林军的实在。如果华不和汪结盟，得罪了汪，反而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断送。即使华和江青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撼动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保卫局也难，所有的电话通讯，甚至车夫、门卫、保姆都在汪的手里。华甚至担心自己的睡房里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

华忧心忡忡，他万万没有想到形势会这么严重，毛一死这么快就剑拔弩张，个个都象白眼狼一样。如果不是汪一再催促，给他压力，他是不会上这个船的。一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二是江青的主要矛盾明显是对着叶剑英和邓小平他们。华想，等到他们两派闹起来，那时才出手不是更好吗？那样华也不会落下个对不起先帝爷的名声。但是汪不依不饶，就怕江青他们先下手。万一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把他九大时期给毛泽东的检查翻出来，汪就全完了。生死存亡，间不容发。政治斗争不能半点手软，也不能有半点同情心。华理解这一点。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得拿。”张玉凤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对汪的动粗提议，华国锋迟疑不决，他要先摸摸元老派的底。九月廿一日，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处，先说了毛死后他工作上的困难，江青如何如何制造麻烦，等等。然后请李去问问叶剑英，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华并没有对李说明他和汪的真实意图。

九月二十五日叶和华在玉泉山，叶的新家谈了第一次话。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叶表了态：“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九月廿七日，华和叶一起到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这次三个人开门见山，就谈如何解决四人帮。华国锋还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汪东兴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叶起先只是听，看到汪的决心很大，非干不可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说，“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以快打慢。具体怎么办，东兴你自己决定，我们用不出力，但我们做你的后盾。”华看叶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叶还建议事情成功后可由元老派的一些人出面帮助维持局势。

三人商议后，叶就去向许多中共元老们吹风，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要苏振华、秦基伟、耿飚等人和他保持联系。元老派的人早在毛病重期间就埋伏在上海，现在更加密切注意上海方面的动静，作好了各种准备。即使汪东兴不发难，早晚元老派也要利用民心 and 文革派最后摊牌。现在，各路人马开始秘密行动起来，互相串联，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家庭开始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再是以前无目的地空发牢骚而已。

但是，叶虽然和他的老朋友们谈论四人帮如何如何不好，以及如何如何对付四人帮等等，却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三人合议的事，更没有提到汪东兴即将行动。李先念虽然先前给华国锋传过话，知道要解决四人帮，会有大变动发生，但这时也不知汪东兴的具体政变计划。叶、华和汪三人最担心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江青他们跑到上海去。元老派都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

老狐狸，他们凭政治舞台上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能猜出了个大概。他们在心里盘算，“华国锋和江青他们有了矛盾，来找叶帅诉苦救助，好戏还在后头呢。”“叶帅现在公开表示对江青的不满，这可是以前没有的呀。”

我们所知道的姚依林这时也悄悄地来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手下有一个小组。他们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文革派偷听。后来他对自己家人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姚依林原是周恩来的亲信，文革前是商业部部长。现在是元老派中的一员大将。由于长期从事经济事务，所以和李先念、陈云的关系最好。在十月六日之前，他都不知汪东兴即将发动政变。

十月四日，华国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汪再也睡不着了。汪找来他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李鑫曾是康生的秘书。前一些日子，张春桥和江青看上了李鑫，以为他是康生的人，许诺将推荐李出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三人随便聊了一会，就问李一些关于警卫团的事，李回答得很畅快。结束后半个小时，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汪。李不是有意要出卖江青他们。因为工作的规定，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写工作汇报。刚才进江青的房间的时候，李鑫保不准有人看见。在中南海里什么事都瞒不住，谁也不敢违反汪的命令。李鑫以前的首长康生已经不在，现在他需要新的靠山和朋友。汪不仅有实力而且也是值得信赖的人。

这次，汪要求李鑫告诉华，说李得到的情报，毛远新从潘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带。李有点吃惊，他担心这样说了华会不会不相信，以后又怎么办？江青、张春桥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搞军事政变不是把他们自己给陷在里面。这样瞎编是不是有点过份？李正在想，汪一句话，“这你不用管”，把他压住了。

凌晨，汪和李一起去见华。李汇报了汪指使他说的事。汪等李先走了才对华说，“现在这个形势，不动也得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华国锋还有顾虑，“万一其它政治局的人反对怎么办呢？”华指的是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中间派的成员。“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汪突然大声把华吓了一跳。

晚上，汪东兴又去华国锋处。他要继续给华压力，直至华下决心为止。华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文革派说是毛泽东的遗训。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今后中国的政治要按文革派的路线进行。而华不同意。华说他接到的毛泽东的手书是“按过去方针办”。华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自然希望今后的大事决策由他说了算，这样就和文革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之前，华曾向文革派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但是他们不听华的，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一套。

华把毛的这句话看得很重，看作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全部权势的根源。而文革派首先要修改和否定华的那句话。这已经说明，文革派根本不把华放在眼里。

深夜，已经疲惫不堪的华国锋对汪说，“不是我想这么搞，实在是他们逼得我这么搞。”华不敢说汪东兴逼他，只能说“他们”，好象是“四人帮”。这样终于同意了汪东兴具体制定的方案。行动时间是十月六日晚上，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汪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

【春秋史笔】

## 毛泽东晚年的宠臣——双面狐狸陈锡联

• 岗 奋 •

陈锡联这个人一直以来被党内成为“双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战争年代是一副模样，在建国后期又是一副模样；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时对某人这样，彼时对某人又是那样。为人相当圆滑、甚至可以说是狡猾。

陈锡联参军的时候还没枪高，他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时，陈锡联才22岁。在我党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陈锡联可谓是厥功甚伟，所以，年仅三十一岁的陈锡联荣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担负挺进中原的重任。陈锡联指挥战役时胆大心细，处理人际关系时小心谨慎。他的战友评价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军中很多名将多少都有脾气，而且，有的还是非常暴烈，一语不合，可能就张嘴骂人，至于牢骚满腹的更多，唯独陈锡联等部分人例外，陈锡联在听取上级领导布置工作的时候，除非是事关战局，否则绝少提出异议。因而，不论是上级如刘邓、还是平级如杜义德等都对陈锡联抱有相当好感。

一九五九年，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次年，宋任穷在恢复大行政区之后首度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是政工干部出身，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功可言，在非常讲究战功的年代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陈锡联对同是上将军衔的宋任穷大加推崇，他对宋在二机部的所作所为高度评价，这让宋非常受用，八届一中全会上，宋任穷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推荐了陈锡联接任他的军队职务。然而，好景不长，宋任穷很快被打倒，陈锡联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陈锡联已经攀附上了黄永胜和谢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后，陈锡联官运亨通，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兼任沈阳部队一把手、辽宁革委会主任兼军管会主任兼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以一名上将的名节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个年轻人，陈锡联的举动虽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实在受益不浅，他吹捧毛远新的辽宁工作是新的辽沈战役惹火了黄永胜、吴法宪，但是，却是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事实证明，他卫护毛远新的功夫没有白下，他后来的政治行情的不断看涨说明他这一宝压对了。

解决林彪之后，陈锡联很快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虽然新成立的军委办公厅十人成员中没有陈锡联，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他，十大上，陈锡联被毛泽东再度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稍后，出任军委常委，主持国防工业工作，四届人大之后，陈锡联又成为副总理，当年谢富治的几样行头都给陈锡联套上了。

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陈锡联在四人帮不在场的情况下，多次表示对邓小平的尊重，他说：又能在政委的领导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决策。显然，陈锡联的表现让小平感到满意，至少陈锡联没有像王力那样小人得志。然而，当陈锡联获悉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把持国务院、军委不满之后，陈锡联立刻投入到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和帮助先念同志端正态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后，毛泽东借口叶剑英“帮倒忙”，“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提升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一时成为军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了。但是，双面狐的陈锡联就此得罪了叶剑英。毛泽东死后不久，叶剑英不顾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销，立刻出来会见外宾，表态自己仍然主管军队，军委办公厅在问及送文件的规格时，陈锡联苦笑的说：还是给叶帅先看吧。1

1973年之后，陈锡联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整顿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大力清洗原来的部众，其中消除了郑维山、聂荣臻的双重势力，也因此得罪了聂荣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锡联的“西山事件”的出笼。在叶剑英等人的压力之下，陈锡联铤而走险，最后把宝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结果证明，他这次真的错了。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附：陈锡联简历

陈锡联（1915—199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第四十师三十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 摘自《海纳百川》网站

~~~~~

【史实辨正】

川岛“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

• 严家炎 •

2002年9月出版的《粤海风》第5期上，刊有余杰先生《漫画钱钟书？》一文，对宗璞女士长篇小说《东藏记》作了自有见地的评析。但文章结尾涉及“文革”中川岛先生所谓“被迫害致死”一段，则因依据的均为传闻，故而严重失实。我作为川岛先生的系内同事和案件的见证人，愿意在查阅原始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对“文革”中发生的此一错案的真相做出如下说明和澄清。

川岛先生（本名章廷谦）受冲击是在1969年8月“清理阶级队伍”的后半期。前半期（1968年冬——1969年春）的北大“清队”，领导者主要来自63军的宣传队，他们在

北京大学两千多名教职员中，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和逼供信的方法“清理”出了“阶级敌人”九百多（占全校员工将近百分之四十）。据当时传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甚感吃惊，认为“打击面过宽”，就派8341部队的一部分骨干于1969年春来到北大（也到清华）重新领导这一运动。新来的军宣队强调“重证据”，进校后不久，就在1969年8月15日举行全校数千人的“落实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宣布将法律系的一位教师和中文系的章廷谦作为“证据确凿”而本人拒绝交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从严处理，实行群众专政。川岛的罪名，是抗战时期“曾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按中共中央政法小组十二人文件规定，是所谓“线上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具体证据有三条：“一，郑华炽1969年8月3日证明材料说：‘章廷谦虽然不是西南联大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委员，但是他在1944年1月在联大附中举行的区党部改选后，被选为文学院区分部委员’。二，冯友兰1968年5月24日和6月13日证明材料中说：‘1939年底或1940年初，由联大文学院各系国民党党员组成的国民党区分部选举执行委员，当选的有我和章廷谦。’1968年7月26日，冯友兰和章廷谦并进行了当面对质。1969年8月10日，冯友兰再次写了证明材料，均坚持上述意见。三，北大保卫组有一份《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情况》的材料，这份材料印证章廷谦1943年曾当选为西南联大文学院区分部委员。材料上写有‘文学部委员：姚从吾、贺麟、雷海宗、章廷谦。’”（引自1975年11月25日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关于章廷谦问题的复查意见》）

表面上看，川岛先生一案有主证，有旁证，可谓“证据确凿”。但其实，当时军宣队急于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宣布“从严”典型，取证工作极为粗糙，许多情况均不明朗，疑点并未排除（如郑、冯二人提到的川岛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时间为何相差三四年之久；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组织到底是区分部还是区党部及属下的区分部；北大保卫组所存《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情况》材料到底来自何处，可信程度如何；为何没有40年代的“敌伪档案”供佐证，等等）。而且，所用主要书面证明材料，都是在宣布定案前十天左右才“急就章”地取得的，根本来不及反复调查核实。至于40年代国民党在西南联大所存档案，更是从未查阅。这种办案态度和方法，显然不符合中共中央历来的指示精神。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军宣队将川岛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案，直接违反了中共中央政法小组十二人文件规定的政策界限。该文件虽然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分队长以上人员定为“历史反革命”，但同时却明确地规定应将大革命和抗日战争两段国共合作时期除外。这是因为，在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曾在国民党内或国民党政府内任职，如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抗战时期周恩来、郭沫若等都在军委政治部内任有官职。如果仅按所任国民党方面职务的高低定位，势必造成极大混乱。具体到川岛身上，即使他真是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也不该违背中共中央规定将他划作“历史反革命分子”。笔者在落实政策大会的当天，曾以戴罪之身就此问题向系军宣队负责人表示困惑与质疑。而在最近向当年参加专案组的教师调查时，竟然得知：1969年8月宣布川岛为“历史反革命”之前，专案组内部的教师（如索振羽）曾与军宣队负责人孙××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的教师（如马振方）还写长信向军宣队负责人申述不该将川岛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理由。然而这种种努力，由于军宣队负责人的主观武断、一意孤行（这位负责人的名言是：“关于章廷谦是否反革命的问题，我们要他是就是，要他不是就不是”），最后均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川岛这一错案之所以造成，根本原因在于军宣队主事者的急于求功、轻率独断乃至玩忽职守。

当然，提供材料的两位证人以及该案的外调取证人员也是有责任的。像郑华炽先生，就曾在1974年12月27日所写复核材料中承认，自己原先的证明有推测的成分。冯友兰先生后来在1974年11月18日写的材料中说：“我是专凭个人的记忆。一个人的记忆是可能有错误的，如果我的记忆同其他同时在西南联大的人记忆不合，特别是同有记录的文件不合，那可能是我的记忆错了。”在冯友兰先生来说，这种记忆上的差错，可能不是从“文革”开始，而

是在50年代就已发生。例如，北大哲学系至今保存着一份冯友兰1958年12月12日填写的履历表，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栏内，冯先生就这样填写：“1939年我在昆明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当时伪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各大学的行政负责人加入国民党，我于是时第二次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蒋梦麟。我当过一个学期的区分部执行委员，本校国文系教授章廷谦可以证明。”也许早在1958年，冯友兰记忆中已经把川岛作为国民党区分部内的“同事”了（所以，所谓“冯为了转移视线，供出川岛乃是一名隐藏的国民党员”的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至于北大保卫组那份《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情况》的材料，后来查实，是他人根据郑华炽的谈话整理而成，并非真的来自敌伪档案（实际上敌伪档案的区分部委员名单中并无川岛的名字），它怎么能冒充第一手材料去“印证”川岛的问题？

最后应该说明，由于川岛本人多次提出申诉，川岛一案于“文革”末期的1975年11月25日由中文系党总支复查，1976年1月15日由北大党委批准（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仍由军宣队担任），撤销原定“从严处理”结论，指出他仅为一般国民党员，并未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职务。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1月28日，经北大十一届党委批准，正式作出《关于章廷谦同志的平反决定》，彻底推翻这一错案。1981年5月12日，川岛病逝于北京大学医院，享年80岁。他的夫人病逝于1990年。川岛在“文革”中确实受到多年迫害，但所谓冯友兰先生的揭发“导致了川岛被迫害致死”，或另有人谓“害死（其）妻小”，显然均属传闻，绝非余杰先生所谓的“确是事实”。

□ 摘自《粤海风》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